

魏忠 编著

方便之地話文明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录 (CIP) 数据

方便之地话文明/魏忠编著.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6. 8

ISBN 7-80135-000-6

I. 方… II. 魏… III. 厕所-文化-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574 号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62 北京崇文区北岗子街 8 号)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6 年 6 月 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6 年 6 月 第一次印刷 印张 5 1/8 插页 0

印数 1—2000 字数 115 千字

ISBN 7-80135-000-6/2·255

定价: 6.80 元

前言

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我们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民族精神的培育,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塑造都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当我们评论某人的行为、或某件事是否文明时,都应知道,这不是他一时一事的所作所为,而是和他平时养成的习惯很有关系,很多文明的、有教养的行为举止,都应从平时点滴小事养成做起。在今天这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奋力拼搏,渴望尽快过上富裕、安定、文明的生活,然而人们还时不时地受着一些以往传统社会留下来的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和束缚,头脑中多少存在着一些与现代化文明相违背的认识上的盲区,这都需要我们从细微之处做大量工作予以改变,努力培养出现代文明生活相适应的新一代。

本书是讲述我国厕所文化及粪土习俗的小册子,是想以厕所这个过去不为人们重视的问题为切入点,力求揭示出我们民族意识中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为精神文明建设略尽绵薄之力。

本书从民俗文化的角度介绍了我国厕所的渊源发展及粪土习俗的演变,书中考察了厕所的出现、名称、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进一步展示了我国古今各地民间厕所、城市公厕等的发展变化,同时也分析了厕所及粪土习俗对我国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人们的思想产生的深刻影响,指出厕所实际上是“一个地区或国家文明程度的综合标志”,它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文化素养。

本书注重事实介绍,寓哲理于叙事之中,力求使读者能在轻松阅读之中获取相关知识。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受到老一辈学者如布罗、罗致平、曹成章、李坚尚、任一飞等先生的关怀和支持,在此特表示感谢。

作者

1996.6

· I ·

编者的话

人类生存离不开吃喝拉撒,吃喝拉撒构成了人生理需要的一个完整过程,对人类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我们在研究人类饮食文化的时候,不应忽略拉撒的情况,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对厕所及粪土习俗的认识。说厕所是一种文化,初看似乎不雅,然而它确实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极深的渊源,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它关系到人们生存环境的净化及精神文明的发展。想当初为了迎接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北京市的领导和工人们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振奋精神,忘我劳动,新建了一系列体育场馆及亚运村等辅助设施,为祖国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可在亚运会期间,香港报纸载文称:大陆金牌最多,然而大陆的厕所最臭。看到这一条消息,很多人心里为之一惊,金牌多和厕所臭这二者之间与我们的民族精神真的有什么联系吗?我们的厕所确实有什么毛病吗?回溯一下历史,我们又是一个有千年厕所文明的古国,当然这里的习俗也是渊远流长良莠混杂,很有必要展示分析一下。

目 录

一、我国最早的厕所	(1)
1. 文献记载	(1)
2. 古代厕所的名称及内容	(2)
3. 考古发现	(4)
二、我国古代各种类型的厕所	(8)
1. 公共厕所	(8)
2. 皇宫富贵人家的厕所	(13)
3. 寺院厕所	(20)
4. 民居厕所	(21)
三、古时的衰器及其他	(28)
四、有关厕所的一些风俗及传说	(37)
五、粪土习俗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49)
1. 粪土与伦理	(49)
2. 粪土与政治外交斗争	(54)
3. 粪土与军事	(62)
4. 粪土与佛教	(65)
5. 粪土与与医疗健康	(69)
6. 粪土与农业	(73)
7. 粪土与城市社会经济生活	(75)
8. 粪土与哲理、文化	(84)
六、今日厕俗遗风	(96)
1. 当今厕所从业人员	(96)
2. 厕所上的男女平等	(103)

3. 今日厕所里的故事	(104)
4. 由来已久的厕所痼疾	(108)
5. 厕所粪便何处去	(122)
6. 其他国家厕所文化的启示	(125)
7. 厕所与高科技	(133)
8. 已经引起各界重视的“厕所问题”	(141)
9. 厕所与现代文明	(151)

一、我国最早的厕所

1. 文献记载

我国的前人“上古穴居而野处”，自然是随处方便，然而为了防止气味对生活的影响或可能招致野兽的伤害，一般来说大小便会稍离开居住点，并处在下风头。夏、商时期，显然是文明程度还不够，故还没有厕所，所有出土的金文、甲骨文中，没有“厕”字，便是明证。

《仪礼》曰：“隶人湣厕。”注为：古人不共厕，湣者填之也，是亦厕为土坑之证也。可见最迟春秋时期已有厕所的名称了。而且那时的人们不使用同一厕所，人死之后，便由奴隶将厕所填上。让人惊异的是那时帝王的厕所竟然与现代的抽水厕所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据《周礼·天官·宫人》记：“宫人掌王六寝之修，为其井匱，除其不蠲(juan 清洁，干净)，去其恶臭。”郑玄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蠲犹洁也。匱，路厕也。玄谓匱猪，谓甃下之池，受蓄水而流之者。”疏云：“谓於宫中为漏井以受秽，又为匱猪，使四边流水入焉。井匱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洁，又去其恶臭之物。”按照前人的注疏，漏井即上面受秽之管，水潦即洩溺，即造成漏井承受洩溺使其漏之于地下。猪者是蓄水，郑玄所说的匱猪就是甃下之池，也就是可以流动的蓄水池，漏井之秽落于池中，受蓄水而流之者，即便溺过后，放蓄水冲秽，使之流出，这种排秽方法，与现代厕所的用意实在是相同的。从古籍的记载上，我们还可以知道春秋时期的厕所有很深的池坎，据《左传》载：“成十年，晋侯将食，张，如

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登天，日及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张者腹胀之意，故如厕遗矢。按照《周礼》井匱的注，厕上有井，下有鬲池，所以说厕所下面一般都有较深的坑坎，晋侯病甚，头重脚轻，故跌陷于池坎之中而卒，想必当时是头朝下栽进去的，这也可能是古代厕所里发生的最大事故了。以上《左传》这段记载说的是鲁成公十年，晋侯将要进食的时候感到腹胀，上厕所的时候，陷进粪坑而死，当时有个小臣早上睡觉时梦见自己背着晋侯升天，中午时分，他把晋侯背出了厕所，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小臣作为人殉。现在山西乡镇的一些土厕所也都是向下掘六、七尺的深坑，而横两板于坎上，人站在上面溲溺，坑深可没顶，令人心悸，这很可能便是晋时的遗风。

《墨子·守城篇》有：城墙上“五十步一厕，与下同溷，之厕者不得操。”《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为乡小吏时，“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数惊恐之……。”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厕所在人们生活中已经相当普及，不仅宫廷、官府、吏舍有之，就连城墙上也定点专设，以备所需。

2. 古时厕所的名称及内容

厕所的厕，古时又叫溷(hun)、圉、轩，溷字，《说文》释：“厕也，从口，象豕在口中也，会意。”《玉篇·广部》说：“厕，圉溷也。”据《释文》说厕：“或曰溷，浊也；或曰圉，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清洁也；或曰轩，前有伏似殿轩也。”圉字本义是猪圈的意思，韦昭注：“豕牢，厕也。”溷字是个会意字，本义是混乱污浊，作为厕所讲，也有猪圈的含义。可见我国古时的厕所，大多是与猪圈在一起的。《国语·晋语四》：“臣闻昔者大任娠文王不

变，少洩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这段话是说，臣下听说过去大任怀周文王时总是生不下来，稍后小便于猪圈之中，生下文王，而没有得什么病。孙臆在魏国受脰刑，为防止庞涓进一步迫害，也曾装疯居于溺中，与猪为伍。汉时甚至帝王之家的厕所也是这样和猪圈在一起，《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焠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汉书·燕刺王刘旦传》记载燕王旦谋反将败，出现了一系列不祥的兆头，其中有一条便是“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颜师古注：“厕，养豕圉也。”厕中有豕必是深坑，一般豕不得出，群出肯定不是吉兆，故史书记载。又《汉书·邳都传》：“贾姬如厕，有野彘入厕，命都击之。”以上可见汉时人们是把厕所和猪圈放在一起的。

这种猪圈与厕所合一的办法，有很多优点：可以把两个污秽的地方集中在一起，减少污染源；人畜粪共贮，便于清理；立体构筑，占地面积小，节省空间；人粪作为猪的辅助饲料，解决了部分饲料问题，也是一种资源的再利用。但此种办法也有一些问题，首先这样做并不卫生，人体的一些寄生虫，通过粪便传染给猪，会出现人畜之间的反复感染。这种寄生虫病在东汉时即已比较常见，《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在路上碰到一个病人，知道他患寄生虫病，便告诉他医治方法，病人“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悬於车而候佗，时佗小儿戏于门中，逆见，自相谓曰：‘客车边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进，顾视壁北，悬蛇以十数，乃知其奇。”这段的意思是，病人听了华佗的话，马上吐出一条寄生虫，便把虫子悬挂在车上等候华佗，这时华佗的小孩在家门前玩耍，碰见客人，自语道：“客人车边挂着虫子，肯定是遇到我父亲了。”客人进门后，看到华佗家北墙上挂了几十条寄生虫，才确信华佗的不凡。华佗家墙上挂了

几十条寄生虫,可见当时患此病的人不少。同书中还有:“广陵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闷,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欲成内疽,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再服,须臾,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另一方面,厕所和猪圈在一起,会使人们自然产生一种观念,认为厕所乃是混浊之地,龌龊不堪,所以又管厕所叫圜,即需要不时清扫使之洁净,与猪圈在一起的厕所要使其彻底清洁并不容易,厕所必脏的认识久而久之一代一代的影响人们的观念,以至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并非闲说》中也讲:“毛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

古厕有垣墙为蔽,《庄子·庚桑篇》有:“适其偃。注‘偃,屏厕也,屏厕则以偃。’”汉时的厕所也是有墙或屋的,用以遮挡。如《史记》中“断戚夫人手足,……使居厕中”和后面的“又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这里的“中”,都是厕所有墙垣的证明。晋时《摩诃僧祇律·明威仪法之一》则规定,男女厕必须隔开,“屋中应安隔,使两不相见,边安厕篋(即厕筹,拭秽之小木片)。”

后来也有人们根据一般厕所所在的位置,将厕所称为东厕,上厕所叫登东。

3. 考古发现

在已经发掘过的遗址中,很少见厕所遗迹出土。比较典型的是1955年5~9月份发掘的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这个村落大约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5年之间的遗存,发现有农民住址6处,那里的三、四、五、六号居住址都出现畜圈厕所遗迹,形式大体相同,都有用方木柱围成的畜栏,栏圈中堆积有畜粪、朽草、灰土等,栏圈后有窄而深的土沟一道,与畜圈

相连,可以看出是作为厕所使用的便坑,有的沟中还存有灰黑粪土,沟边垫有数块平石作脚垫,其中以第三居住址最为明显。这种厕所与畜圈相连的情况,不但今天东北农村还可看到,在汉代墓葬明器中也有很多这种情况的反映。

所谓墓葬明器即“冥器”,是古人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一般用陶或木石制成,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历代墓葬中都有发现。在随葬明器中,除仿制的应用器物外,尚有房屋、田地、仓、井、灶、猪圈、家具等模型,可以考证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汉代墓葬出土模型明器中的陶厕具有多种形式,大约反映出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异。经过专家粗略分类,大致可见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单厕与猪圈结合式。这种厕所通常是由圆形、椭圆形或方形围墙(围栏)构成猪圈,圈内或附有陶食槽和陶猪,厕所架筑于正圈之上,厕所屋顶有两面坡或四角攒尖等形式,厕门外多有便于人上下的斜坡道,厕内地面开有长方形便坑,下通猪圈,粪便可由此落入圈底。有的厕所墙壁还开有小窗以利通气。

第二种类型是双厕与猪圈结合式,主要特征是在长方形猪圈两侧或对角分建两座厕所。湖南长沙伍家岭汉墓出土的一件陶厕,中间为猪圈,圈后墙上搭檐棚为猪舍,前墙正中开一洞作猪的出入通道,圈两侧对称造起两座形制完全相同的高台厕所,厕内有便坑分别下通猪圈,,各自门前有台阶。还有的陶厕将厕建在猪圈对角的平台上,一厕是硬山两面坡顶的小屋,一厕仅有带门的短墙,两厕便坑皆通猪圈。河南南阳杨官寺画像石墓出土的一件陶厕最为精美,两厕分置对角,后厕与圈上作敞棚悬山顶,开有天窗以散臭气,地面印斜菱纹以象征铺设菱纹方砖。两厕形制各异,后厕便坑设台上,后有尿

槽，下有粪池，旁有台阶，前有遮墙。前厕就简单多了，仅有一个矮台便坑和短遮墙。这类厕所分置两侧，有些还表现出大小精陋不同，只能是两种情况，或以分男女，或以别主仆。

第三种类型厕与居室、猪圈结合式。如广州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陶屋模型，底屋四周以矮墙围成方形猪圈，后墙开洞便于家畜出入，房屋架筑于前半部矮墙上，上有悬山屋顶，正面辟门及直棂窗，左居室，右厕所，中有门相通，厕所地面中部开一长方方便坑下通猪圈。居室直通厕所固然十分方便，但不免要被臭味困扰，令人不快。相比之下，广州东郊麻鹰岗东汉墓出土的一件陶屋就要好些，陶屋由三幢房子组成“凹”形，前一幢横长为居室，其余两幢对称列于后院两侧，两侧屋外有斜梯通各门，左为厕所，右为畜舍，居室不直接辟门入厕及畜舍，两相隔离，防止臭味逸入。郑州南关外西汉晚期墓出土一件陶院落模型，由门房、阙楼、仓库、正房、厨房、厕所六部分组成，若以院落面南而言，厕所则在院的东北角，上厕下圈，顶为悬山式，朝院内一面开有正门，右侧还有一小门通正房，左侧墙开一小方窗，厕内地面上开两个长方方便坑下通猪圈。

最为有趣的是在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室中还修有一座几乎和原来一般大小的属于第三类型的厕所，此墓有前、中、后三个中室和五个侧室，厕所设置在东北角的侧室内，侧室后部横隔半墙，内为厕所，便坑开于三面靠墙的石台上，便坑前有尿槽，两边有脚踏垫和一对柱状扶手。似乎安卧棺中的墓主人还能走出棺外享用这舒适的“五谷轮回之所”，足见墓穴营造者用心之周。

第四种类型是极简陋的台形厕圈合一式。如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一件，整体如一只反扣的平底钵，周壁镂刻数个竖窗和一门洞，顶部开有一长方方便坑。这种厕所的原形应该是

在户外砌一中空的原台，下养猪，台上为厕，如厕者四无遮拦，颇伤大雅。（张建林《从出土陶厕明器谈起》）

从丰富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出，汉代时厕所建筑已出现多种形式，最为常见的是圈厕合一形式。许多厕所结构合理，设施齐全，内有尿槽、脚踏、台阶、扶手、屋顶有天窗，地面铺花纹砖，很是讲究。魏晋隋唐墓葬出土的陶厕模型，并不见比汉代有什么大的改进。

二、我国古代各种类型的厕所

现存的中国古代建筑典籍中,如《营造法式》、《鲁班经》、《工部工程做法》等,对于房屋的建造,大都是从设计和施工角度阐明问题,对建筑群的总体设计和规划几乎没留下什么资料,现存的唐宋元古建筑都是些单栋孤构,总体布局如何诸如厕所的位置等都有待进一步探查。

1. 公共厕所

随着古代都市的发展,管理城市卫生成了重要的问题。我国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规模很大的城市,如“临淄之中七万户,……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史记·苏秦列传》)。那时的城市卫生管理也是很严格的,《荀子·王制》中,有治市官要“修采清”的要求,即安排人管理清扫厕所,安排人清扫的厕所自然是城市的公共厕所。商鞅立法有:“步过六尺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蜡氏管理城市卫生时,也曾“令州里除不蠲。”那时管理城市卫生包括公厕,已是市政官员的份内之务。

为了军事目的,城市公厕有一种分布方法,《墨子·备城门》有城上“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圉。”治让案:“上厕为城上之厕,圉则城下积不洁之处。”这种城上之厕是为了在战争时期供守城士兵使用的,以免他们远离岗位。城下之圉则是在城市被围时期,城内人们都到指定地点使用的厕所,这是为了粪便统一处理,以防止城内遭受污染,瘟疫流行。

周至秦汉时,为了便于控制城市居民,实行闾里制度。几十户上百家聚居一处,各“里”都筑有“里垣”,“里”内各户不得直接对街开门,必由里门出入,“里”有里吏管理治安,里胥负责看门,早晚出入有一定时间,晚上则关闭闾门。《三辅黄图》云:“(汉代)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城市采用经纬涂制的道路网,街道是棋盘式的,街道的宽度都有严格要求,以致“里”的形制规整,“门巷修直”,所以厕所是不会修在大街上,又因生活在闾里内的人夜间还要方便,因此公厕只能修在闾里之中。

隋唐时期,承袭汉朝以来的闾里建筑并实行夜禁,住区采用里坊制,里坊平面近于方形,东西 520 米,南北 560 米左右,有些稍大,里坊四周用高大夯土墙包围,大坊四面开门,中辟十字街,小坊只有东西二门,中间一条横街,街宽 20 米左右,坊内还有较窄之巷曲,坊的外侧沿街部分主要是权贵官吏的府第和宅院,这些宅院可以直接向坊外开门,不受夜禁限制。唐代规定,坊门早晚要定时开闭,以击鼓六百下为号,晚间关闭坊门后,街上就要断绝行人,否则就是犯禁,“犯夜”要执缚,有时被通宵执缚,按律要笞二十下。只有持有县、坊方牒的病人,婚嫁、有丧事以及求医药者,才不算犯夜。这种制度直到唐末都是严格执行的。按唐律,越坊市垣篱和官府廨垣以及侵坏者都要受同样处罚,杖七十下(《唐律疏议·卷 8》)。如不按时开闭坊门,与越垣同罪,城市只有在朝廷特许的情况下,才准夜间开放,唐玄宗下诏,每至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夜开坊市门,以庆祝上元节,此后永为定制(《全唐文·卷 32》)。按规定,非三品以上的高官以及“坊内三绝”的特权者,不得向街开门,必须由坊门出入,这种制度也是严格执行的,直到唐代后期,一些高官,身为宰相,也还从坊门出入。这样严格的

管理,就是里坊之内的公厕夜间使用也大受限制,平民百姓家里必备便桶,这是由于当时城市的政治管理制度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决定了公厕所在的位置及其利用。唐时公厕之少,也可由一则古时流传的笑话印证,“唐时一丞,偶因马上内逼,急诣大优穆刁绫宅,已登溷轩,而优适至,丞惭谢之。优曰:‘侍郎他日内逼,再请光临。’”(冯梦龙《笑史》)这段笑话是说,唐时的一名官员,骑在马上忽然感到内逼即要解手,便急忙就近跑到著名艺人穆刁绫家,已经钻进厕所,正好这名艺人也来了,官员只好道歉,艺人随机应变说:“以后内逼,再请光临。”

后来由于商业的发展,为了解决流动人口的解手问题,仅在里坊之内修厕所是不行了。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宋的街市已是十分繁华,人群熙攘,商旅匆忙,街上势必要修公厕,与此相配合,则要求有很好的城市排污系统,当时东京城内沟渠纵横,下水道十分发达。“新旧城为沟注河中,凡253条”(《资治通鑑长编·卷104》),而且极深且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至盗匿妇人,又谓之鬼矾楼。”(《老学庵笔记·卷6》)东京排水排污主要靠这些沟渠,“每遇春时,宫中差人夫监淘各城渠,别开坑盛淘出者泥,谓之泥盆,候官差人来檢視了方盖复。”(《东京梦华录·卷3》)当时从事城市卫生管理并以此为生的,已有了一支专门的队伍,《梦梁录·卷13·诸色杂货》中记载了南宋临安的情况,“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各支钱犒之。”同时“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jian 倾倒)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至经府大讼,胜而后已。”粪主各有地分坊巷,出粪人是粪主雇用来的,他们把粪便运到农村用作肥料。每到新春,官府经常差遣人淘沟疏渠,清

除道路污泥，平时则由居民自己雇人淘井清厕。

封建统治者对城市的卫生管理也是有很多弊病的，尤其是处于王朝没落时期，京城也不例外。明朝屠隆描写北京的情况是：“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屠赤水小品·在京与友人》）明末彭孙贻的《帝京十二咏》中这样写道：“长安佳丽地，宝马间雕轮。车马所践场，遗矢相因陈。条风一动物，吹作五色尘。既上侍中貂，亦满丞相茵。薰衣少香令，秽形无壁人。粪壤为百合，牛溲剂五卒。此中驰骛者，不厌污车巾。”作者对满街粪便的不满心情，作了无奈的抒发。

大都市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有无公共厕所是关系市民健康的大问题。从历史上看，明清时期的首都北京，公厕极少，由于居住拥挤，甚至一些人家也无厕所，或是随地方便，或是便于马桶之中，倾倒于街旁沟渠内，几乎是满街狼藉，臭气逼人。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卷3》谓“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复作厕矣。……京师则停沟中，俟春雨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他在该书卷2更直接指出：“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又多蝇蚋，……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明末作家王思任，曾写《坑厕赋》，副标题是“虽厕亦屋，虽厕亦清，惟越所有。”在感叹之余，王先生描写京城无厕之苦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光访优穆，或内逼而不可待，裨谌谋野，又路远莫致之……”（《文饭小品·卷1》）此篇以厕为赋，真是有感而发。明代的幽默大师陈铎，编过一本滑稽月令，在二月下，极尽嘲讽京城太脏之能事：“是月也，壁虱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明万历时，礼部的奏疏中说，自宣武门外东响闸起，至正阳门外御河桥，长约三里的地方，“水色尽赤，深